

推荐给学生的优秀课外读物



罗新慧◎著

The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EXPLORE

探索中华古文明

举世皆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屈原老夫子曾经慨叹“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从认识它的源头开始吧！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The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EXPLORE

探索中华古文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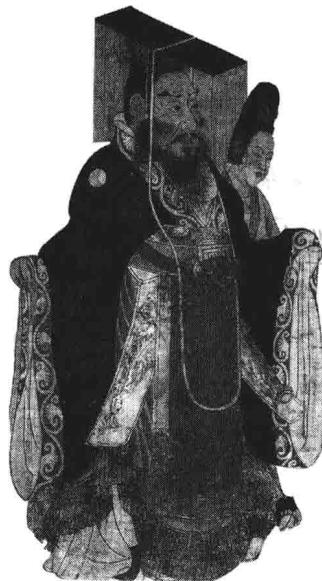


罗新慧◎著

The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EXPLORE

探索中华古文明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中华古文明/罗新慧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11
(探索古文明书系/刘东主编)
ISBN 978-7-5513-0129-9

I.①探… II.①罗… III.①中华文化—文化史—古代
IV.①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187号

探索古文明书系 探索中华古文明

主 编 刘 东
著 作 者 罗新慧
责 任 编 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 面 设 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 式 设 计 刘兴福

出 版 发 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凤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35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129-9
定 价 25.80元

版 权 所 有 翻印必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可 寄 印 刷 厂 质 量 科 对 换
邮 政 编 码 065200

总序

对于世界历史上的诸文明、文化，前人已作过不少探索与反省。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巴比伦、埃及的文明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深深的敬意。近代从伏尔泰开始，当代以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为代表，更是从文明或文化形态史学的角度对人类历史上迄今发生过的能自成一体的文明或文化，进行过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就是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定义，也众说纷纭，据说不下百余种。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应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最后一次跨越。文字、城市、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其重要的外在标志；相对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文明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人类并非在历史的某一时刻都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人类最初的活动区域又相对集中、相互阻隔，因此形成的文明体不论在时间、空间上，还是在内在结构、外在形态上都各具特色。诚然，古代诸文明之间并非决然不通，相互间的接触、交流也可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但那是边缘性的、局部的、浅层次的，不可能触动或改变诸文明彼此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方向。即使是后来在一文明或某几个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新文明，仍具有使自己自成一体的基调与特色。因此，不管人们对文明如何界定，这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实体却镶嵌在人类历史的整个画卷上了。我们可以对它们作出任意的解释，也可以

用另外一种社会发展图式把它们的位置重新安排,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形成了对“文明”定义的认识,即,文明是一定社会、民族、宗教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斯宾格勒首次把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文明实体作为历史的研究单位,认为它像动植物一样有其内在的诞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规律。汤因比虽然也承认文明兴衰的必然,但他用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解释了新文明的产生,并认为新文明的出现并非旧文明的循环,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前进。无独有偶,这两位都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感到担忧,但又强打精神,以西方文明(斯宾格勒更多地寄希望于德国)目前最有生命力、最有可能复兴来慰藉自己。对于他们的理论,学术界评说不一,但他们将文明作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单位来进行研究,确实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本丛书也把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同样重视其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多少年来立志献身于世界文明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为了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性的历史借鉴,为了繁荣学术,使中国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培养新一代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者,多少年来甘愿坐冷板凳、蹲书斋,从事如今最“冷门”的学问,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思之常让人感叹再三。然而如何使他们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不再成为象牙之塔内的珍藏,不再仅被少数人解读,如何能使它们为世人广泛注目,从而起到启人思索、催人奋进的作用,让人穿过时间的隧道,去与古代的文明结识交往,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确实是摆在我们这些研究者面前义不容辞的义务。西方人以“失落的文明”、“失落的瑰宝”、“卢浮宫”等为题来重现世界文明的风采,赢得千千万万的观众。

由于学识浅陋,且时间紧迫,丛书中定有错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对此我们只能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不吝指正。

本丛书的最初目的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包括文明的历史兴衰变迁、文明的内涵外延(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信仰、自

然科学)等诸方面来全面系统地展现诸文明的全貌,特别是凸现贯穿于其中的文明精神;行文尽量通俗生动,让读者于轻松无意之中体会到人类的伟大,感受到历史的启示,倾听到时代的召唤,激起对古人的敬慕,以及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这是我们寄予的希望,究竟能否如愿达成,也只能留待读者们去品评了。

杨巨平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滥觞	(1)
一、大河源头的文明曙光	(1)
二、步入文明的门槛	(7)
三、中华文明的形成	(11)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兴盛	(20)
一、古道秦风	(21)
二、汉代昌盛	(24)
三、魏晋风度	(32)
四、隋唐盛世行	(36)
五、宋元精神	(45)
六、明清嬗变	(51)
第三章 丰厚的中华物质文明	(62)
一、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	(62)
二、东方城市	(69)
三、长期领先的科技	(76)
第四章 意境悠远的中华文化艺术	(84)
一、汗牛充栋的史学	(84)

二、瑰丽的文学	(92)
三、和谐完美的艺术	(109)
第五章 博大精深的中华精神文明	(116)
一、百家争鸣——精神的觉醒	(116)
二、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	(133)
三、宋明理学	(139)
第六章 中华文明与世界	(147)
一、中华文明的魅力	(147)
二、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	(157)
跋	(165)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滥觞

举世皆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屈原老夫子曾经慨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我们关于中华文明历史轨迹的求索，就从认识它的源头开始吧。

一、大河源头的文明曙光

人类历史的发展由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而迈进到文明时代，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为进入文明时代进行酝酿的时期正是考古学上所命名的“龙山文化”时期。

以分布区域广泛、文化内涵丰富为主要特色的龙山文化，因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有影响的典型文化。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在龙山文化以外，其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也扩大了分布范围。这是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比过去迅速发展的结果。

考古资料所见新石器时代后期金属器具出现最早的地区多在齐家文化分布的地域。“齐家文化”得名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在甘肃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广泛分布，其时代约在距今 4000 年左右。齐家

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当时已掌握了复杂的烧窑技术，这与齐家文化颇具特色的冶铜业的出现很有关系。

认识这些考古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产生有什么作用呢？其作用在于，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当时的物质文明进展到了何种程度，让我们能考虑到一种文明的出现应当以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低为基础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大家了解得比较多，然而对于文明时代的降临所进行的精神方面的准备，则所知甚少。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即通过对于那些个时代艺术、宗教等情况的分析，了解进入文明时代前夕我国境内的远古先民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

我们先来看当时文化观念与原始艺术发展的情况。

在中华文明中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艺术中，用彩绘、雕塑、刻画等手段创造出生动而古朴的动物和植物形象，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之一。仰韶文化的陶器内壁多绘有鱼、蛙、壁虎、鹿和鸟类的形象。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盆绘有四只构图简单的小鹿，充满跳跃奔突的情趣。临潼姜寨所出陶盆内壁绘有一只正向盆沿蹒跚而行的笨拙的大蛙，瘦弱纤细的腿爪与满背圆斑的肥硕颈腹相映成趣。河姆渡文化雕刻精细的象牙制品中有双翼平展滑翔飞行的蝴蝶、引吭鸣啼的双鸟，陶塑作品里有略显肥胖的憨厚小猪，陶器往往饰有稻穗、叶子等图案。当时他们所创造最多的是在人们印象中属于善良、温顺型的动物，它们或比例匀称、或憨态可掬、或色彩艳丽、或鸣啼昂首，总是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个时代，特别是其早期和中期，极少见到凶残、丑陋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虽然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饕餮纹之类的狰狞形象，但那是行将来临的新时代的文化在旧时期里的萌芽，从本质上讲它并不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对善良、和谐和美的追求才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主题。这与当时人们的原始民主平等观念和和谐、乐观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不少关于女阴崇拜、男根崇拜、男女同体等方面的概念。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泥质褐色彩陶壶，上面塑绘裸体人像，为男女同体之像。这种男女同体的情况还见于辽宁

东沟县后洼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件陶塑。这件作品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相传远古时代原为兄妹，后来配为夫妻的伏羲、女娲就是“二神混生”（《淮南子·精神训》），为男女同体之神。当时的人们普遍关切人类自身繁衍的问题，各种生育崇拜都是对于这个问题思索的结果。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表明，在中华文明中，舞蹈起源得很早。青海大通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舞蹈图案陶盆，是记载当时舞蹈情况的宝贵资料。这件陶盆的内壁上部画有三组舞蹈图案，每组有五位身材苗条匀称的年轻女子，其身躯稍微倾侧摆动，双腿稍曲，似乎是在准备迈出更为轻盈动人的舞步。每组人物手儿相牵，步伐相同，头上的发辫和身后的尾饰都随舞蹈节奏而向同一方向摆动。《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这件陶盆上的生动舞蹈形象，简直可以说是原始画家笔下的“葛天氏”乐舞。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已经有多种形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郑州大河村和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都是十分宝贵的实物例证。

下面，我们再来看当时的原始宗教的情况，看看原始宗教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思维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萌芽的原始宗教在新石器时代有了较快的发展。原始宗教观念中存在着大量落后、闭塞、愚昧的成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于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迈向野蛮时代的进程来说，原始宗教也有一些历史进步的因素。原始宗教往往和死亡、坟墓相关联，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惟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他认为如果没有死这事，那也就没有宗教了。从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死亡和坟墓是人生的终点，但又是宗教的起点。梁漱溟也认为：“世间最使人情志动摇不安之事，莫过于所亲爱者之死和自己的死；而死最渺茫难知。所以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两条件：情志方面正需要宗教，知识方面则方便于宗教之建立。”^①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新石器时代的祭祀场所多建筑在山顶上，如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所发现的良渚文化的祭坛就建在瑶山山顶，由里外三层组成布局规整的祭坛；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坐落在大凌河西岸山梁正中的突出台地上；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红山文化女神庙也建在山顶。湛蓝的天空以其深邃与浩瀚而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将祭祀场所安排在山上，当是人们认为这里距“天国”比较近的缘故。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浙江余杭反山都发现有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为祭祀而用人工筑成的土山，表现了对“天国”的执著向往。占卜习俗是当时人们对于自然与社会进行探索的一种特殊方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有占卜用的甲骨。

对于自然与人类以及宇宙，原始先民很早就有了思考和探索。新石器时代的迷信与科学常混杂在一起而难以区分，在原始的宗教观念中往往有某些积极成分。如果说当时的占卜表现有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思考的一面，那么原始巫术则多少含有人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斗争的积极意义。新石器时代的巫术主要有驱除魔鬼、诅咒敌人、比拟模仿等形式，施行巫术者最初可能是氏族内的长者、酋长或其他有威望的人，以后才出现了专门化的巫师。《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上古时代人们驱除旱魔的咒语是：“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认为要让旱魔向北退去，必须首先开挖沟渠。这显然蕴含了人们向旱灾进行斗争的经验。相传上古时代的伊耆氏曾首先倡导举行以祭祀农神为主的蜡祭，还要迎接猫神和虎神，因为它们可以吃掉祸害庄稼的田鼠和野兽。蜡祭时的祝辞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表面看来这是对神灵的祈求，实际上却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整治田地、中耕除草、防涝治虫等农事经验的总结。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绘有地画的房基。地画正中绘有手持棍棒类器物作扑打状的男女两人，其下方绘黑线长方框，框内画两个头形近圆、身躯椭圆的动物。动物头上有向后弯曲的触角，身上有弧线斑纹，下有弯曲长腿和长尾，似为蝼蛄螟蛾一类危害农作物的昆虫。两虫被黑框围住，可能表示已被降服。这幅地画是相当珍贵的巫师降鬼图。当时巫术所呼唤的神灵的威力

实际上是人类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的能力的曲折表现。这方面的积极意义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古代社会逐渐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个阶段，许多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除了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之外，社会观念的变迁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观念在野蛮与文明之际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

新石器时代前期，人们在自然界面前的自由程度还很低，所以在社会观念中缺乏对于崇高和力量的赞美。当时人们喜爱与自己亲近的动物、植物形象，并用各种手法去表现它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在粗犷而可怕的自然现象面前不再只是迷惘和叹息，而是试图去了解它、征服它，对于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大家便十分尊崇。夸父追日、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反映人类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的传说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期的人们所敬慕的是英雄，是比自己更高大、更神圣的东西。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器物上屡见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以繁复的回旋纹路突出了神人或神兽的巨大眼，在其上的云雷纹中还有神面和双眼，犹如天神在变幻莫测的云雷中俯视人间，其形象处于若隐若现之间，显得非常神秘。良渚文化常见以神人兽面像为主题的纹饰。神人有倒梯形的脸面，重圆形的眼睛，鼻下是布满上下相对利齿的阔嘴，头上戴有高耸宽大的羽冠。神人腹部有巨眼、獠牙的兽面形象。神人双手直指神兽两眼，似乎只是轻轻一点，就已经将神兽驯服。神人和神兽的形象毫无和善妩媚之态，但却在狰狞与丑陋中表现出一种降龙伏虎般的威力之美。它能使人肃然，使人敬畏。这种对神的尊崇实际上是对人世间权力的讴歌，是对英雄的颂扬。

战争的起源是先于阶级与国家的起源的。在新石器后期，关于战争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了复仇而进行的械斗和杀伐也存在，但毕竟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可是在后期，以氏族贵

族的贪欲和权势欲为契机的战争却日益频繁。由于战争的需要，武器制造也愈益精良。石峡文化的石钺和石簇，齐家文化的铜刀、铜匕和铜斧，都是典型的杀伤武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有石质和骨质的护臂，它们就是防御性的护身武器。新石器时代后期墓葬中，骨架残缺、身首异位、缺臂少腿、首躯不全的现象屡有所见。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一具腿部有箭伤的骨架，箭头尚在腿骨中，深达2.7厘米。死者为一中年男子，其左手握骨匕，左肱骨下置石斧，表明其生前是氏族中的武士。残杀俘虏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所见。龙山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乱葬坑，与氏族墓地正常埋葬者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的贵族墓葬往往随葬有斧钺之类的武器，以示其勇武。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也是对于战争的一种颂扬。

就社会面貌而言，城市可以说是文明时代的标识之一。最初的城市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近年在湖南省澧县车溪乡发现有属于屈家岭文化中期的城址，这座城址大体呈圆形，面积约7.65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护城河以及东、南、北三座城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等部分组成，城墙现存最高处达3米以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城址由东西并列的两座略呈方形的小城组成，面积约2万平方米。呈正方形的平粮台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后岗城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城址，略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略呈方形的边线王城址，面积约4.4万平方米。这些城市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生产比较发达，地域平坦而便于交易，物质财富和知识文化比较集中，具备了城市形成的条件。作为一种人为的便于人们生活居住的环境，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各种活动的中心。它不仅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且使人们的眼光从本氏族投向更大的范围，甚至可以看得见文明的曙光了。

二、步入文明的门槛

纵观人类历史的演进，可以说历史是以加速度运行的。而文明的积累则是历史运行“加速度”的保证。历史正是世世代代的新陈代谢，依次嬗递的结果。

一般都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远古时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开始逐渐形成。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中华文明的开端与发展是跟夏朝、商朝和周朝密不可分的。

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从禹子启开始，夏朝正式建立。夏朝共历时四五百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之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是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太康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时，夏王才恢复了统治。曾经见到过《汲冢纪年》材料的晋朝人束晳说“夏年多殷”（《晋书·束晳传》），认为夏朝比殷朝的年数要多。他可能是把尧舜的时间都算在了夏朝之内，也可能只把盘庚迁殷以后至纣王的时间算作殷朝年数。

夏王朝时期，氏族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夏王出自姒姓族。夏朝时期有许多方国部落，见于《史记·夏本纪》的就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冥氏、斟戈氏等。《吕氏春秋·用民》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如果说夏朝有几千个方国部落，那还是可信的。夏朝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国家也只是雏形，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夏朝与众多的方国部落之间。夏桀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夏朝失去了诸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从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对于夏王朝的情况虽然我们所知甚少，但它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例如，商朝的统治者每以夏的覆亡为历史的鉴戒。汤臣仲虺曾经说：“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丧〔厥〕师。”^①认为夏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夏王矫诬天命而虐待民众，引起上帝憎恶，故而丧师灭国。周朝统治者每以夏为自己的正宗，周人屡称自己为“有夏”。《尚书·君奭》载著名政治家周公的话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分析周何以能够灭商的问题，说上天“乃悖我有夏，式商受命”。周人以夏自称表明姬周族与夏族关系密切，甚至其可能原为夏族分支，所以才对夏表示十分尊敬。《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认为夏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周朝统治者必须汲取夏朝覆灭的教训，才能够长治久安。

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等不仅具有开辟奠基的意义，而且对于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孔子对于夏礼很感兴趣，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以自己懂得许多夏礼为荣耀。相传夏的开国君主夏后启曾经“舞九韶”，对于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十分欣赏，认为它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夏朝的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由于符合天象而历来为人们所沿用，孔子就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相传说车、造酒等技术都是夏朝时期所发明的，并且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对后世生产和生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继夏而起的商朝是由子姓的商族所建立的。据古代文献记载，商的祖先契与舜禹的时代约略同时，可见商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商在早期是活动在黄河下游北方广大地区的部落，时常进行迁徙，到了成汤时期商族活动在今冀南、豫北一带。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按照《史记》的记载，商朝共传

^① 《墨子·天命》中篇引《尚书·仲虺之告》。